

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王 杰

摘 要：香山文化于近代横空出世，引领了岭南文化的方向，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走向和社会转型。作为岭南文化的奇葩，它承沿于传统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圈；从历史地位来看，它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它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

关键词：香山文化；岭南文化；特质；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7;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9-0156-08

作者简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10）

香山文化久矣。打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置县屈指算来，已逾 850 余年。就地域文化而论，香山文化既承沿于古代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圈，冶先进文化于一炉，立于岭南又艳于岭南，成为岭南文化的奇葩，进而辐射全国；从历史地位来看，香山文化逐渐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香山文化已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香山文化与文化香山研究，此也其时！

移民亦移文：文化与时空俱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香山文化崛起于近代，得益于大海的恩赐。秦至南汉时期，香山仅由五桂山、黄扬山等系列孤岛组成：“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①几百年前的横琴岛，依然“烟开万顷碧，木落九霄清”^②，渔舟不往，荒无人迹。山贫水险，成了古代香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天然阻隔。然而，山荒水阔，又成了香山人求生图强、向外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沙田日淤，昔之浩荡而去者，今则曲折回薄而不能达……而田日美”^③，至光绪年间，“西临大海，弥望稻田，万绿无际”^④。少年孙中山首赴檀香山的感慨如是经典：“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⑤这是何其豪壮的大海感怀！

濒海之利还给香山人带来了异质“文明”。四百多年前，葡萄牙的商船战舰东侵澳门，“红毛”“蓝眼”挟着“野蛮”与“文明”的威风冲击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香山社会。西方文化与香山固

收稿日期：2006-07-20

① 银铠：《中山邑史考》，《中山文史》第 37 辑，第 4 页。

② 何志毅：《珠海风物》，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9 年第 2 版，第 187-188 页。

③ 光绪《香山县志》卷七《经政》，《水利》，第 31 页。

④ 光绪《香山县志》卷四《舆地上》，《山川》，第 19 页。

⑤ 《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7 页。

有的传统相碰撞使得香山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辐射站。亲历其景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听香山译者》和《香墨逢贾胡》等诗篇中，作过“花面胡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树田园不树桑，玳珂衣锦下云樯”的描述，刻画了中外文化融通初期，香山与内地大相异趣的生活风貌，也揭示了商业文化对此地的影响。

海洋的恩赐，不仅体现于沙田的拓展、农桑的生繁、商贸的兴昌，还引发了移民的涌入，从而推动了香山社会经济和地域文化的调适与变迁。历史上，百越经历过三次大的外来移民。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屠睢率兵 50 万南征五岭，使相对封闭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第一次接触。公元 4 世纪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香山偏处海隅，或许成为移民迁徙的选点。及至南宋咸淳十年（1274），官军追杀出逃的贵妃，迫使南雄珠玑巷的 33 姓 97 户人家结伴出亡到广府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相当部分籍落香山。南宋末年，宋端宗携部属败走伶仃洋沿岸，宋亡，大部宋室及其部属的后裔流寓香山^①。三次中原人口的流迁与留居，以第三次为甚，此次的大批移民即是以香山为落脚点的。

移民亦移文。随着外来人的安居，中原的文化习俗亦随之与香山社会融合，他们在积淀艰难开拓、勇于冒进的文化性格的同时，还铸就了与乡民相互兼容、和谐共处的新文化性格。《永乐大典》云：“建安以后，中原人士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于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至明代，又有不少大户南迁五桂，繁衍生息，耕读传家，和谐续代。

移民的输入，使得香山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为之一变，不仅海纳移民，也输出移民，于亦纳亦移中互动，在互动互补中内化，从而凸显其地域文化的特有个性。

香山人首先通过澳门的商贸活动，与西方文化发生接触与兼容。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西洋的物质文化，而且也展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宗教习俗、经商理念和科技文化精神，西方“强盗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文化性格，潜移默化地冲击着“天朝上国”子民们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经历了惊恐、排拒、疑惑、忍耐和接触、沟通、兼容、互动的过程之后，香山人得以先于内地人完成了与异质文化共处的心理过渡。澳门的司法档案文献可引为佐证：“鬼奴者，番国黑小厮也。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②嘉庆二十一年（1816），澳门发生黑奴酗酒殴打“民人”梁全佐案，香山县丞令：“谕到该夷目，即便传谕该夷主，将打烂梁全佐缸瓦照数赔还，约束黑奴，毋得复行滋事。”^③这则史料说明，于嘉庆年间，香山人对西方人（含“鬼奴”）的态度已经比较理性，在处理土番司法案件时，将“民事”交由“夷目”办理，表明对“夷目”不卑不亢，也反映了有清一代香山人对外来人事的兼容心理，为香山移民海外奠定了心理基础^④。

香山向海外移民，始于明，盛于清乾嘉以后，早期表现为赴海外谋生与拓业。乡人远涉重洋，置身于南洋文化、欧美文化的氛围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之互动，为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愧为中学西（南洋）渐和西（南洋）学中渐的媒介先驱。《良都竹秀园月报》曾如是描述：“降自今日……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一家数口，皆瞻仰外洋之资，甚至以懒惰不事为清闲，赌博浪游为消遣术”，故婢仆亦纷纷“好言高远，新名词语，冲口而出……衣服时装，日新月异；金银首饰，千般万化；石岐来往，三天一行；一衣一衫，付之缝工；一线

① 参见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载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5 页。又见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 年版。

② 金光祖，康熙《广东通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 页。

③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基金会 1999 年版，第 603 页。

④ 容闳出洋留学便是由澳门的教会学校和美国的传教士推荐，并带到美国的。

一履，购之于市。不惜男子远涉重洋之艰苦，日望汇金之有无。”^①

这些移民，还应包括赴上海、天津、九江、汉口等地先做买办，旋而从商的一大帮人。他们在外获得了较丰厚的报酬——乡间几以“金山客”为荣，“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渐次，一人带动一群，一群带动一村，一村影响四邻，四邻辐射全县。香山变成一个“动态”移殖的社会。在一种开放融通和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里，香山人比内地人先于接触和接受外来文化，也先于把中国文化传播于海外。于双向移殖和双重互动之中，他们减少了拒外、排他和封闭的心理，增强了善于沟通、取人之长、兼容协作的进取意识。这种意识在不断的互动中升华为一种精神与品格，通过内化——积淀——外烁——反哺的过程，令香山文化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地缘与血缘，跨越时间与空间，立于岭南而又优于岭南，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的新质文化。这里仅撷取反映下层民众素质之一例，或可窥见香山文化底蕴之一斑：辛亥广州光复前后，“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出身多绿林，成份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②，“各路民军纷纷入城，社会秩序至为紊乱，杀人越货，视为常事。惟香军纪律严明，西关一带，市廛不惊，市民深得保护，军誉至佳”^③。

先声亦先行：文化引领政治潮向

香山文化的深厚内存^④，蕴含着“爆发性”的驱动力。静为动所伏。香山文化一经“爆发”——从特定意义上说——便从“边缘”跃进了“前沿”。就历史使命和地位而论，香山文化之“先声亦先行”者，大致建树于以下三个维度。

1. 思想政治文化

容闳是首位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大学（耶鲁）学士（文学）学位和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留学是以爱国和报国为动机的。留学期间，“无时不耿耿于心”者，“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当他考取耶鲁大学的时候，美国传教士要他保证以传教为职志以便领取奖学金，容闳毅然谢绝了：“予虽贫，自由所古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⑤为了践行将“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之宏愿，容氏奔走呼号 17 年，最终促成清朝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成就了中国留学事业的破天荒之举。容闳不仅倡行西学东渐，而且着力中学西渐之事业，他对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和中国图书的收藏功不可没^⑥。1878 年，他将 1237 卷中国书籍运往耶鲁大学图书馆，次年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讲座学者，由是谱下中美文化交流的开篇^⑦。容氏的传世之作《西学东渐记》（中译名），记述其 60 余年来以西学报国的艰

① 《论我乡妇女之坐食》，《良都竹秀园月报》第四期。

②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8 页。

③ 《中山修志通讯》（4），第 39 页。

④ 关于香山文化之深厚内涵，基层社会的资料应最具说服力。笔者从宣统二年（1910）“香山县农务分会总理董事会衔名折”中发现，该分会总理、董事和候补董事 20 人，有翰林院编修 1 人，进士 1 人，解元 1 人，举人 6 人，优廪生、廪贡生、附贡生、优附生等 10 人，职员 1 人，可见其文化层次之高。会员中也有相当数额的附贡生、附生、增贡生、监生、增生等。参见《署理两广总督袁为请委黄玉堂为总理并另颁图记事致农工商部咨文》（宣统二年四月），中山市档案局（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10—1020 页。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第 1 辑第 2 册，第 58—59 页。

⑥ 高宗鲁：《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吴文莱等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0 页。

⑦ 耶鲁大学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容闳毕业时赠给美国同学的中文格言，并附上英文，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A Great Man never forget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有志者事竟成”（where there is the will the work is effected whatever it may be）。可见容闳为中学西渐的努力苦心孤诣。

辛历程。尤须多记一笔者：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位海外赤子的拳拳心愿，“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伴随他终身，他虽然安葬在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而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文‘容’字图案，却象征着他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①。

被学者称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②的郑观应，乃敢为天下先者。他指出：“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齟齬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③关于“商战”思想，郑氏认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④。他力主用“商战”来对抗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亟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工商业。他言以行俱，一面呕心沥血续写《盛世危言》，呼吁政治改革，一面躬身商业，实践“商战”，从做买办到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60余年不辍，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先驱和最先触及启蒙思潮的前驱^⑤。

“共和之父”孙中山，乃敢为天下先共和者。他“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并为之鞠躬尽瘁，其引领潮流的三民主义思想，令同侪难以望其项背。一位出身于小山村的农家子弟，未满而立之年就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并把目光瞄准世界潮流的前沿，破天荒提出创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毋容置疑，开放兼容、务求开新之地域文化性格，实是哺育和激励他追赶时代潮头的力量源泉。

因为胞兄孙眉在檀香山成功创业，孙中山有幸于孩童时代涉足世界，旋于檀香山和香港完成西式学业，较为系统地领略了时代文明。中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激发了孙中山变革中国政治理念的萌发，而传统广府人的好胜心理^⑥，乃是驱使其冒险进取的乡土因子。大学毕业后，他很快完成了从“医人”到“医国”的思想转变，至上书李鸿章遭拒后，踏上救国救民的职业革命生涯。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以香山地缘、血缘文化圈子为凭藉的。受海外华侨炽热的强国愿望的激励，他于檀香山组建了以华侨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开创了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在经历了十年艰难顿挫的“孤军”作战之后，为聚集力量，“合成大团”，他审时度势，适时登上全国舞台，创立同盟会，揭橥三民主义，沥五年之肝胆，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洪流，推翻了绵延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创立了中国的共和政体。尔后为捍卫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进行了不懈斗争。为了攻破国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政治文化心理障碍，他创说“知难行易”，“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⑦。孙中山毕生可贵的文化取向是“取法乎上”、“与时俱进”。晚年，为了适应世界政局和国民革命的需要，他适时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催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狂飚，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旗手。他“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政治文化理念，于今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文化遗产。

① 章开沅：《“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序言》，《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4页。

②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④ 《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⑤ 参见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王杰、邓开领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版，第10页。

⑥ 有说：“中国人好胜及第一之心理，以粤人为首屈一指”。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5日。按，孙中山于香港西医书院肄业期间与学友倡言革命，人称“四大寇”；假期返乡途中常为平民受欺压事表示愤慨。

⑦ 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自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页。

2. 买办文化

就文化背景而论,买办文化乃香山文化的特产。作为香山乃至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源于早期的中西商贸活动,与香山得风气之先,适应风气之先息息相关:“许多买办都是香山人。香山是珠江口的一个半岛,邻近广州和香港,在早期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①

香山买办出世早、人数多、群体化、裙带式、散布广。据汪敬虞先生研究,1830—1900 年 70 年间,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 9/10,其中香山人尤为突出。唐廷枢一家三代都做买办,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②。徐润、莫仕扬、郑观应等都是著名的买办,而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同乡接替其位置。“香山人”几乎与 19 世纪的“买办”同义,时人有称香山为“买办的故乡”。

就主要表征而言,靠“洋泾浜”起家的香山买办文化,其表征亦以“洋泾浜化”相脉承、共始终。“买办商人受雇并依附于外商,但作为外商的代理人,他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买办商人和外商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通过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发展成为一种制度。”^③与之因应者,买办文化便表现出两重性。于文化心理层面言,它是寄生于中西文化之间、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双重性”表现为:作为文化融通的媒介,既不能偏离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又要顾及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不免两相游离,两难定向;买办成为外商的代理人,为商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自己又赚了钱,自然有成就感。如莫仕扬,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其家族亲友在太古洋行充买办者累计达千人之众,员工中流传“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财富达数十亿之多^④。但由于利益的葛蔓及传统社会的偏见,他们被时人视为崇洋媚外和唯利是图,因之也有屈辱感。马建忠说“唐、郑、徐皆该商素所蔑视之买办,一旦与之抗衡,犹挟主奴之见,所以售地、租埠,以及引用总船主,犹有主奴之见存也”^⑤。就买办文化地位言,由于买办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交方面的影响,买办文化便在实际效应上成为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沟通的桥梁,因之,又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特殊领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称之为“洋泾浜”形态。

洋泾浜,不洋不中,亦洋亦中,半洋半中,洋中混杂,或曰中西夹生。体现于生活层面的买办文化便是这种样态。买办的生活方式,包括衣着、住房、欢宴、饮食、信仰和社交,中西混合,招人惹目。据说徐润最为典型,他喜爱西式器物 and 食品,又钟情传统的生活情调:“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一位外国人记述了 1843 年上海开埠后的情景:“在很短的几年中,来自英国的砖瓦运来了,有阳台拱门的砖房很显眼地在(黄浦)滩前铺展开来……设计图是由外商绘制,由中国建筑师加以修改,使之适合本地材料和中国技术……这种常见十九世纪,华中和华南各条约口岸的建筑式样,被人诙谐而恰当地命名为‘买办式’”^⑥。

与生活方式孪生,买办文化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亦显出中西兼用。郑观应、徐润等笃信风水、沉迷长生不老术,捐官买爵,却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子女到国外求学,做买办,而不让他们涉足仕途。从文化地位上说,与其说是“边缘人物”创造了“边缘文化”,倒不如说“洋泾浜”不失为晚清社会多元文化之一元。

①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 页。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③ 周见:《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1 页。

④ 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8 页。

⑤ 《盛宣怀档案·马建忠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五月初七。藏上海图书馆。按:唐、郑、徐,指唐廷枢、郑观应、徐润;该商:指怡和、太古商行。转引自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

⑥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1 页。

就买办文化的作用而言，它是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买办文化的效用是充当中西商贸活动的润滑剂，它呈现出一种务实的、融通的文化性格，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同质的文化交流，必然促使其比较两者之优长，择其最佳取向。郑观应就从中悟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道理：“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这便是买办文化的结晶。由是，他们利用丰厚的买办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顺利集资与业务拓展，乃是由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群体的倾力持助而成的。唐廷枢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而且为开平矿物局引入了现代技术，使之“逐渐变成了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他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 40 余家，属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 6 家。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文化。所以，当他们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倡行者的时候，就必然成为某些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者和挑战者，客观上充当了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

概言之，买办文化既受主体文化（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对主体文化（不同质的文化）施加反影响。从被动态上说，它是世界走进中国和中国面向世界早期在商界催生的混血儿；从主动态上说，它是土生土长挟洋风洋味行世的洋泾浜，客观上又催生了近代工业文明。

3. 华侨文化

香山华侨移殖海外，早在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海商吴添进就已通番^①。清嘉庆以后渐见高潮，布及东南亚的槟榔屿、新加坡、美洲的檀香山、三藩市、加拿大、秘鲁及日本等地。

香山华侨文化与其他地域的华侨文化具共性者，乃曰同“根”。个中之“根”，表于两个层面，本文曰“移根”和“守根”。“祖也者，吾身之所出，犹木之根也。”^②不忘其根，是华人文化传统之本。这里所说的“移根”，属观念层面概念：华侨到了异乡，与异质文化共处，如何不忘其根？面对客居他乡的现实，就只有将家乡的观念移至客地，以弥补其乡思之淡薄与缺失。1802 年陈氏在檳城大伯公街建立“香邑公司”，创建香山侨民在东南亚的同乡会馆，用木板书写“香邑馆”置于门口，崇奉财帛星君龙牌，每年七月廿二神诞，乡民均前来开怀畅饮，思乡寄情。1882 年，程汝楫在檀香山创立中华会馆作为香山人的乡族组织。1891 年隆都人组织“从善堂”，其他各都也相仿成立乡谊会，还有按姓氏组织的彭氏宗亲会、李氏敦宗公所等。意识层面上的“守根”，指故乡有妻室者，稍有积蓄，便思归故里。许多人坚持不娶土著洋妇，俟手头宽裕后便回乡娶亲。据统计，1852—1882 年间，回乡省亲者达四千多人。

香山华侨文化还为家乡和祖国输回了“金”。这里所说的“金”蕴含三层意思，曰“金子”、“金技”、“金身”。“金身”即是香山的特色，令其他地域文化难相匹敌者。

“金子”，此指侨汇。华侨对桑梓的贡献最著者为侨汇。侨汇既是侨眷生活的保障，又是拉动消费和促进香山经济发展的杠杆。早期侨汇主要是赡养家眷及养老送终金。后来一些人“落地生根”，侨汇逐渐转向投资和捐献。或置田建房，或投资实业，或捐资办学，或输将慈善，功能日渐多元。“金子”对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历史俱在。碉楼，以及沙涌、竹秀园、北台、南朗、沙溪、三乡等地中西合璧的建筑物，至今仍展示当年的审美观念和歷史价值，更折射出海外艰难拓业精神和爱国爱乡品格。“金子”投资实业、热心公益的义举，既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建设，繁荣了故园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改变了乡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引发了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全方位加速了香山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金技”，此指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南朗濠涌村人严迪光早年赴美国经商，1908 年，率先办起香山机器制砖有限公司（合作），为香山第一家具备先进设施与规模的近代企业。1912 年

①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香山》卷二，引自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的形式及其经营方式》，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 页。

② 程一枝：《程典》卷十九，引自叶显恩《香山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第 105 页。

由他创办的迪光电力灯所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乃民国临时政府注册的40家先进发电厂之一，其后又在“马锡水”兴建水电厂，成为广东华侨投资的第一间水电厂^①。香山侨民每当家乡救灾赈饥，必文明捐输，对修桥铺路，兴学赠医等亦踊跃输将。《檀山华侨》一书记载过部分捐款数额：1930年美金51546.48元，1931年美金22628.45元、洋银12310元；1932年美金76975.95元、洋银261392.5元、港币1000元；1933年美金7988.045元、洋银50922.72元。

“金身”，指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和为国捐躯。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对华侨报国功勋的高度赞扬。檀香山可以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南洋各埠是孙中山流亡海外往返的落脚点，日本、欧美等地也是他奔走革命的客居地。香山华侨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不但慷慨纾难，且奋勇当先，给孙中山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有统计，1895—1912年间檀香山华侨先后捐助美元8000元，银洋63255元。尤堪称道的是孙中山之胞兄孙眉，乃“茂宜岛大畜牧家，牧场广千数百亩，有茂宜王之称”，为筹备革命经费，“便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兴中会员邓松威（又名荫南、三伯），“尽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决心”，膺从孙中山起义。檀香山巨商杨昆之子杨仙逸，在美国学会航空技术后，追随孙中山，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黄花岗一役，华侨参加者众。据翠亨孙中山故居“香山人与辛亥革命”展览的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期间，参与革命运动的香山人有近260人，其中翠亨、南朗有42人，香山籍华侨不下200人^②。尔后，孙中山组织讨袁护法，又有华侨“义勇队”、“敢死团”拼力支持，不少华侨血洒沙场，以身许国，为捍卫民主共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概言之，香山华侨文化早期充满艰辛和血泪，渐次誉载文明与荣豪，它以“根”为本，以“金”为奉，播中华文明于海外，输现代理念于桑梓，在香山的近代文化史上地位显要，价值弥珍。

资源亦资本：文化创新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与魂。香山文化对当代中山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给民众一种无以替代的归属感及精神纽带，从深层次上也塑制了现代中山人的群体性格，将文化资源逐步转化为文化资本，并间接推动了中山现代工业化都市的兴起与腾飞。

1.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凝结与展现

经香山文化熏习的中山人，在文化资源发掘与承传的基础上，群体精神已进一步内化与升华。

(1) 先导性。以名人文化镜鉴，祖籍香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不下100位，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艺、医学等领域，其中荣膺某一领域“第一”的约有30位。建国后，中山人“敢为天下先”的品格，得到进一步弘扬：广东第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第一个勤劳致富的“万元户”、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温泉宾馆、中国首家高尔夫球场、首家中外合资大型游乐园、国内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首届中国合唱指挥大赛……均在中山问世，不仅使中山在“改革开放”之初一跃成为全国发展的“典范”，而且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2) 包容性。中山市承传文化多元、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1996年，市政协通过《关于提议市政协增设外来员工委员的报告》，古文平成为全国首位在异地当选政协委员的外来工。1997年，外来工左忠文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199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优秀外来员工”评选表彰活动，对“优秀外来员工”免收城市增容费，绿灯注册入户，“农转非”。举凡在全省乃至全国或属先例。一位外来企业家感慨地说：“我跑遍珠三角创业，相对而言，中山市从上到下对外来工和老板不歧视，挺有人情味的，对这一点，我体会确实很深。我现在赚了钱，开个茶室，

① 《中山发现1913年所建电站》，《广州日报》2005年8月15日。

② 本数字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展览资料，由林华煌、黄健敏整理提供。

不对外，图三五个知己聚会方便，饭食从简，免费。学一点中山人的博爱精神啦！”

(3) 求实性。务实、趋利，在香山人的群体性格中素来浓厚，在今天，这种不讲虚文、只求实效的“经济理性”，表现尤为明显。迄今为止，中山市有近 1/3 的家庭从事私企或个体老板。另外，集群经济、民营经济、外源型经济发达，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地级市第 12 位。

(4) 博爱性。中山人的博爱情怀不仅积淀于心中，而且外化为行动。于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慈善万人行”，不仅具海外轰动效应，更引市民以为荣豪。19 年来苍桑不改，越办效应越好。这项民间盛举还得到海内外香山人的支持与参与，已筹集善款达 4 亿元，用于安居工程、“身边的希望工程”等，已成为当代香山人的一种新民俗，直可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拓展与创新

文化创新，关键在于自尊与自觉。当代中山人在弘扬与创新香山文化方面，正由这一理念指导运行，并建树多多：于动员市民发掘香山文化精髓，融会现代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赋予“慈善万人行”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升华为“传承伟人故里历史文化，弘扬中山现代人文精神”，使之成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有效载体；开设城市论坛，搭建市民公开表达意见、参与公共管理的平台；高标准重建孙中山纪念馆，新建市文化艺术中心，建成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大力修葺名人故居；创办“好山好水好儿女”名人省亲活动，拉近了当代文化名人与家乡的情感；建立美轮美奂的文化艺术中心，成为外界观照中山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承办博鳌亚洲论坛 2005 国际文化产业会议，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开展香山历史人文资源的学术研究，撰编《孙中山志》、《中山历史文化丛书》、《人文香山》和《香山文化》等学术精品，在全省率先于学校开展乡土教育；开展“大香山”旅游项目合作，优化整合旅游资源，等等。历时 4 个月的市民文明意识与行为调查，先后吸引 28 万市民直接参与和讨论，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转化为广大市民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过程，让文明成为市民的共同认知与追求。

“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①孙中山这一名言蕴涵了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弘扬香山文化的出发点和宗旨^②。进一步将香山文化资源催生为文化资本，臻“物质文明”、“心性文明”于相待发展，乃世人对文化香山之愿景。

（责任编辑：许宏海 薛立勇）

Appearance and Features of Xiangshan Culture

Wang Jie

Abstract: Xiangshan culture, which emerged in modern history, led the direction of Lingnan culture and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s part of Lingnan culture, i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nt beyond the restriction of region and blood. Seeing from its historical status, it was the frontier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and led the fashion of the era. Examining from modern civilization value, it transcended the history, transformed the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cultural capital, and explored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mode of the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Zhongshan and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a.

Key Words: Xiangshan Culture; Lingnan Culture; Feature; Modern Value

① 孙中山：《对外宣言》，《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525 页。

② 崔国潮：《香山文化：中山发展的精神动力》，《学术研究》2006 年第 6 期。